

# 方言，一种母语的迷失

冯东航

## 越来越远的乡音

几乎是在中国的所有的大城市，“请说普通话”已经成为重要公共场合的一种默契和自觉，在单一一种铿锵声调的淹没中，或者会在某个瞬间，有人低头接通来自远方的电话，一种略带羞怯与不自信的乡音，悄悄地从普通话主宰的现场流出，表明我们身后的世界，有着并不单一的背景。

而小城市在向大城市亦步亦趋的拙劣模仿中，普通话作为“先进的语言”，有此参照，乡音几乎是土气和落后的代表。在成人的暗示下，孩子们不仅在学习“自觉使用普通话”，乃至在游戏和生活中，也毫无障碍地弃用家乡话。乡音成为祖父母的语言，但却再无传承。乡音，记载着“我从哪里来”，也是维系着一种乡土感情的载体。而每一种乡音的消失，不仅伴随着乡土社会的式微，也昭示着现代社会令人堪忧的同质化前景。

再说一个官方公布的数字，说2005年全国已经有8%的普通话新生代，这些新生代除了普通话，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，尽管他们所处的地方肯定是有方言的。请注意这是13年前的数字，按照近10多年推广普通话的力度，这新生代增加的速度，应该不会低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吧。

就算不看数字，每个家里有小孩的人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吧，相当多的小孩不会用方言跟家里人沟通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厉兵是这样分析“新生代”产生原因的：“第一，跟家庭结构有关系，比如说父亲是北方人，母亲是南方人，家庭语言，很可能不用任何的方言，孩子从小就缺少方言环境。第二，孩子从托儿所、幼儿所到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交际语言主要是普通话。第三，存在一个价值观的问题。孩子从小就认为说普通话是时尚的、有品位的，那他自然就拒绝了使用方言进行交际。”他提到的第二点，有人认为

是不少的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对国家语言文字立法的错误理解，将普通话当做学校唯一用语，恶意排斥方言，

如有些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，在课外也不准说方言，这样就从孩子开始，掐断了方言的使用和传承。

事实上，用“濒危”一词来形容许多汉语方言的生存状况绝不为过，且不局限于使用人数较少的方言，不少的“大”方言也面临这个问题。不少的青少年即便还会讲家乡方言，他们的方言也是“日新月异”的，词汇，甚至读音都迅速普通话化，严重的不得道，非常没有“土”味。就拿“大”方言上海话来说，据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的统计，上海话中有特色的，而在普通话里没有的单音动词，就有最少74个词在现今大学生一代已消失不再用了。另外，据苏州大学教授汪平的调查，在小学二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中，70%已用普通话代替苏州话做交际工具，超过半数不能用苏州话谈论学习，只有15%认为“使用家乡话更熟练”，诸如此类的生存状况配得上“堪忧”吧。

胡适曾在《海上花列传》序中说过：“……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……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，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，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。”方言如果真的消失了，许多鲜活“神理”就会消失，以之为基础的地方戏曲、曲艺或其他口头艺术也就跟着没有了，地方的历史与地域文化将会是残缺不全。我们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但它是由几百种甚至几千种地域文化滋养、汇聚而成，而方言就是地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方言消失了，一个个各具特点的文化载体就这样消失，就像物种消失一样，为什么要保护方言，这跟问为什么要保护大熊猫是一样的。

## 方言，语音里的丰富世界

《剑桥语言百科全书》的开头是这样写的：“我撰写本书的意图是要赞美人类语言，颂扬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们。其目的在于阐明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表达的广泛性、复杂性和美。”《剑桥语言百科全书》中有关方言的部分这样说道：“所有语言

都被分析为一系列方言，这些方言反映了其使用者的地区和社会背景。这种观点认为每个人都讲一种方言——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，标准的还是不标准的，上层阶级的还是下层阶级的。从语言结构来看，没有一种方言比另一种‘优越’。”



安庆市井生活 汪军 摄

这本《剑桥语言百科全书》是英国的语言学家戴维·克里斯特林编著的，然后我“自然地想到国情这个问题。若只是谈汉语方言，那它就是汉语的变体。2007年，国际标准化组织把汉语分为13种方言，分别是闽东方言、晋方言、官方言、莆仙方言、徽方言、闽中方言、赣方言、客家方言、湘方言、闽北方言、闽南方言、吴方言、粤方言。普通话在一些地方，比如台湾，被称为国语，这个词来自日本。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，并称之为国语，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也称为国语。1911年学部通过《统一国语办法案》，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，取代原来满语的地位。

坊间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：民国之初，粤语一票之差

而不能成为国语。说当时国会订立国语时，因粤籍议员超过半数，粤语成为国语的呼声相当高，但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，逐一向议员游说以汉语北方话作为国语，最终，粤语以一票之差败给北方话。其实，类似的传说，洛阳话有，陕西话有，连四川话都有，都是说只差一票。先说孙中山的“顾全大局”，他于1912年的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，情人节的前一天辞职，愚人节那天正式离职，他的临时大总统只当了3个月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他的“大局”恐怕有限吧。

事实上，在孙中山去职8个月月后，才由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，其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，称为“国音”。读音统一会最后确定下来的一共80人，其中来自江苏的有17人，浙江9人，直隶7人，福

建、广东、湖南各4人。河南的和陕西的各两人就不用说了（四川3人），广东的4人，似乎也没什么资格说“只差一票”吧。江浙地区的代表占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，但吴语似乎就没有那“只差一票”的故事，其实，各省的代表人数也没太大意义了，因为会议最后决定一省一票，而不是一人一票。一个多月后，读音统一会共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。

不知道是谁炮制了“只差一票”的故事，但这若是你要保护你的方言的理由，就算是真的又如何，那些差2票3票或者79票的就不值得保护了吗？

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，大家都明白，是人们交流、沟通的需要，但是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可以并行不悖，为什么一定要对立起来？

## 重建保护方言的社会共识

每年的2月21日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“世界母语日”。在中国，现代化的高速进程中，语言多样性的危机更加凸显。每个人的母语可能都是一种方言，但这些年来，方言地位逐渐沦丧，不断边缘化乃至一些方言最终消失，这将抽空汉语应有丰富多元的生态。保护母语方言，如同保护文化多样性一样，应该成为社会共识，而“推普”工作也不应该和方言保护对立起来，以扼杀方言的生机为目的，应该给地域文化留一线生机和生存空间。在此背景之下，我们应关注方言母语的现状和危机，关注地域文化、方言在文化多样生态

中的价值和意义。

保护方言，在政府的层面，最起码要做两件事情：第一，是要厘清一些概念，明确一些说法和做法。比如，要明确方言是中华文化不应分割的一部分，是应该要保护的一部分，要明确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不是对立的，是可以并存共行的。九年义务教育中的语文部分，已足够令到接受教育者可以熟练使用普通话，这还说不足够简直就是荒谬，要知道普通话不是外语啊！还有，就所有科目都是用普通话来教学这一点来说，还不会这不自相矛盾吗？

上面提到的校园用语，课堂用语和会议用语都用普通话

这没问题，但校内广播用语就不应那么严格，播一些本地方言童谣总是可以的吧，至于集体活动用语，大的活动应该用普通话，小的就不应限制得那么严吧。

第二，政府要建立各地方言的话语音档案，组织专家编制方言地图和方言词典，收集和保存方言资料。至于在民间，保护方言可以做到很好玩。比如在笔者的家乡，就有年轻人在网上发起“家乡话接龙”游戏。

每一种乡音，都有一方水土的情感滋养，都带着一方民众的性情体温。保护方言，犹如保护我们与生俱来的独特与尊严。（作者系作家）